

舌尖上的粤语

郑惠芳

联合早报，2013年6月2日

我常觉得，人们今天把只谙英语的单语华人说成“香蕉人”，其实对他们不尽公平。他们若早生 20 年，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华族祖语，也懂传统文化和礼教，也会情系祖籍文化。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则由中国广州本土文化网站羊城网创作题为“舌尖上的粤语”的文化微视，内容讲述广东话的起源与发展。制作单位很用心地搜集并呈现资料，讲述广东话或粤语是等同于华语或普通话的独立语言，而不是附属于后者的“方言”。

片中说，广东话是古时中原的语言与岭南百越民族的部落土话长期交融磨合后产生的语言。若比较粤语和世界其他语言的历史，现代英语产生于约 1550 年莎士比亚时代，于 17 世纪在英国成为较通用的语言。而广东话比英语早诞生了 600 年，于公元 900 年便出现使用了。而至于我们这里称为“华语”的普通话，其实是大清时代的官话。1909 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的大清官话定为“国语”，后来因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便将“国语”改称“普通话”。

社会语言学里流行一句话：方言是背后没有军队支撑的语言（a dialect is a language without an army）。这说明语言经常沦为政治工具，甚至被强势团体利用来建立并巩固地位。许多地方在设立官方语言时都经历了各种斗争，各社群都为自己的语言争取地位。然而，不管斗争的结果如何，即使母语成不了官方语，母语也不会被剥夺身份。

新加坡独特的地方是，政府在制订四种官方语言之际，连个人的母语也得改头换面。第一代华族移民多数来自中国南方，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华语作为母语。政策制订后，华语英语成为许多人都得学习的两种新的语言。人类的沟通是充满智慧的，总会找出最简洁的方式表情达意。当以前惯用的共通语不给用了，人们就必须在短时间内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共通语。新学不久或学而不精的非母语必须脱口即出，于是，在同一句话里混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夹杂各种母语口音的华语英语应势而生，新加坡本土语言环境逐渐形成、茁壮、乃至成熟。新语（Singlish）绝对不是人们因惰性或学语不精而发展出来的语言（如果是的话，在殖民时代就应该出现了），它其实是我国语言政策下的产物，在社会上流通的各类语言磨合兼容并蓄的结果，这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也是语言演变的必经路程。

我们今天努力培养双语双文化精英，我们的先辈，许多都是双语，甚至是多语人才，不管是英校生华校生，都能流利地说自己的祖传母语。即使不识字没读书的叔叔婶婶，也都能讲两种以上的社会流通语。但因为语言政策硬生生将祖语阻断，连在家和跟家人朋友都鼓励讲“官方母语”，要同时学习两种新的语言，而英语是工作语、被认为是出人头地的语言、来自前统治者的语言，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变得显而

易见。我常觉得，人们今天把只谙英语的单语华人说成“香蕉人”，其实对他们不尽公平。他们若早生 20 年，也能讲一口流利的华族祖语，也懂传统文化和礼教，也会情系祖籍文化。

语言趋势跟语言行为不能混为一谈，认为转变语言行为便能扭转语言趋势。在一定的程度上这行得通，但必须像当年搞讲华语运动一样铺天盖地强硬推行，不过这样的手法在现今社会已经不被接受。因此，唯有真正理解语言趋势背后的推动力和形成因素，并认真检讨，在必要时更得大刀阔斧修正有偏差的意识形态，再落实到政策上，因为生活的语言必须从生活着手。

我的祖母 106 岁，她讲的是一口有浓浓乡音的广东四邑方言。虽然她二八年华就离开家乡，在新加坡少说也住了近 80 年，闲暇时看的电视剧都是华语配音，但打从我有记忆开始，她跟谁说话都是操着一口有浓浓乡音的四邑话，自然、淡定、纯真、美丽，没有急着跟上时代的矫情、没有因不符政策的不安，更没有牵强附会的卑微，堂堂正正，坦坦荡荡，风吹不摇，雨打不动。这份坚定，没什么，就是对自己的出生自己的成长充满自信与尊敬。你若问她，为何没学或不用华语，她不过莞尔一笑，似乎那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广东话是我的母语，我自娘胎出来就说这个话，后来读书才学华语和英语。是的，我对广东话情有独钟，因为那是我的祖语，我成长的语言。我对华语也同样有深厚的感情，因为那是我汲取知识和进行思考的语言，也是我在情急时冲口而出的第一语言。

女儿比祖母迟一个世纪出生，自她牙牙学语我便以广东话跟她交谈，刻意让广东话成为她舌尖上的语言之一。虽然她上托儿所后较常使用华语，但至少她在与太婆见面时，能用太婆懂得的语言向她问候。这关系的不只是曾祖孙辈沟通的问题，还有祖辈文化的传承，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联系。

对祖语祖音的维护，只要发心尽一己之力，已是一种成就。你愿意吗？

作者是政策研究所研究员